



人迹罕至处 青春亦芳华

——记云南省无量山自然保护区景东管理局护林员刘业勇

苦”。只有刘业勇坚持了下来,从他16岁的青春年华开始。

科研人员的好助手

跟踪一段时间后,刘业勇惊喜地发现,这些长臂猿不怎么怕自己了,可以近距离跟随,不再像过去那样见一眼就消失。不仅如此,有时,调皮的长臂猿还会跟刘业勇开玩笑。中午休息时,长臂猿们看见刘业勇他们吃东西,会故意在他们头顶上晃动物树枝,甚至拉屎撒尿,让人哭笑不得。

对于自己的小助手,大几岁的范朋飞评价说:“向导工作没那么简单,关键是了解无量山上的动植物名称,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了解长臂猿的生存习性、食物喜好、活动范围等。别看阿应只有初中毕业,但他非常聪明好学。”

阿应是刘业勇的小名。植物的形状不好记,刘业勇便给它们也起了各种各样的“小名”,死记硬背下来,等研究植物的专家过来时再详细请教;植物的用途太广泛,刘业勇就编各种顺口溜帮助自己记忆。日子久了,刘业勇对长臂猿达到了惊人的熟悉程度,只有初中毕业的他和科学家们一起发现了长臂猿喜欢的食物及其分布秘密。

这个秘密就是,无量山2000米左右的高海拔地区,季节性限制明显,导致黑冠长臂猿食性较杂,无花果、杜鹃花、猕猴桃等上百种植物以及一些小动物都是它的食物来源。

他们还发现,长臂猿的栖息地生态存在危机。长臂猿最喜欢原始森林,但偶尔也会去次生林栖息。由于保护区周围放牧过度,导致次生林生长缓慢,必须对次生林的恢复进行人工干预,种植长臂猿喜食植物,才能尽快改善其栖息环境。

就这样,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刘业勇和范朋飞在地势险峻的无量山,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批野生黑冠长臂猿的“习惯化”,开创了我国不投食“习惯化”长臂猿的先河。这个消息登上了当年的《新闻联播》。2006年,范朋飞顺利结束博士研究。

然而,刘业勇与长臂猿的缘分远远没有结束。范朋飞走后,他的师妹,研究人员黄蕾接力来到无量山,刘业勇又成为黄蕾的向导和研究助手。无量山自然保护区景东管理局的领导也被刘业勇的坚持和诚心打动,19岁的他成为保护区的正式护林员。

每天天不亮,他就赶在长臂猿起床之前赶一两个小时的山路去它们夜栖的树下开始观察。每隔5分钟,记录一次长臂猿的行为活动,主要是“五行”:吃、玩、理毛、移、游。以吃为例,需要记录吃什么、如何吃、吃多少、什么时候吃等。观察工作通常会持续到中午以后,长臂猿开始午睡。遇到特殊状况,还会留在原地继续观察、记录。

工作辛苦、枯燥、乏味,但刘业勇却做得很认真。多年下来,他积累的十多条记录数据,为很多国际动物学界著名学者的科研著作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建立生态走廊等长臂猿保护措施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基础。

2010年,云南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根据刘业勇观测记录的长臂猿喜食物种,实施景东黑冠长臂猿保护项目,帮助恢复了600多亩已破坏栖息地。

此外,数十位专家在其帮助下完成了分量颇重的几十篇研究文章。荷兰灵长类专家Helga,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研究员蒋学龙等国际动物学界名人都曾借助他,他也曾为许多摄影者和考察专家当过向导。不爱表现的刘业勇,只有在这时才略夸张地说“做的工作一时半



刘业勇(左二)在陪外国专家考察。

会儿说不上,这只是千分之一”。

“要死一起死”

在无量山里行走,不只是科研与巡护,更要应对日常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每到这时,刘业勇便是定心石。

2011年7月,无量山迎来了每年的雨季。连续几天,大雨滂沱。一天晚上,黄蕾被一阵轰隆隆的声音惊醒,还未反应过来,狂泻而下的泥石流就冲断后窗铁条,进入黄蕾所住的一楼卧室。床瞬间被冲散,泥石流马上就淹没过黄蕾的脖子。

缓过神来的黄蕾刚想开门逃命,可门已被泥石流堵死,根本打不开。想从冲坏的后窗爬出去,可是后窗自有源源不断的泥石流涌进来。

好在这时,隔壁的刘业勇和妻子邱玲也醒了。情急之下,刘业勇拿起平时砍柴的斧头,“哐哐哐”几下连劈下去,劈出一扇求生之门。微光中,黄蕾看见两位助手都在外面,但她已经四肢无力,不敢往外跳,“快点啊,快!”刘业勇当机立断,探进身来,迅速把她拉了出去。几秒钟之后,一波更大的泥石流涌而至,将一楼完全吞没,通向二楼的楼梯完全堵住。

凄风苦雨中,3人在树下淋了一夜的雨,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开始下山。后来听说,有3位村民在巨大的水流和泥石流中殒命。

黄蕾回忆说:“当时我让他们赶紧逃命,可阿应却跟我说,要死一起死。”危难之际,生死相托,这份情谊让黄蕾十分感念。

平时,有危险来临,也是刘业勇冲在前面。在山里,他不怕苦,不怕累,但最怕两样东西,一是山白鱼,二是蛇。一天半夜,邱玲醒来后,发现黄蕾脚边有条蛇,很像剧毒的竹叶青。黄蕾吓得一动不敢动,生怕不小心激怒了它,邱玲赶紧小心翼翼地挪到隔壁,把睡梦中的刘业勇叫醒。他拿起一根棍子,把这条竹叶青挑了出去。

生活辛苦而又充满惊险。但刘业勇说自己爱上了长臂猿,爱上了在山中虽然艰苦但很自由快乐的时光。

有一阵,刘业勇对摄影着了迷,时常拿着相机练习拍摄。

他曾给“大老黑”的家庭拍过一张照片。“大老黑”是刘业勇跟踪观察的长臂猿群体的老大,和刘业勇几乎一样的年纪,刘业勇常说,“大老黑”是看着他长大的,而他也亲眼见证了“大老黑”从全盛时代到衰老,最终被儿子替代的过程。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在西黑冠长臂猿监测中观察到这种复杂的现象。

采访札记

他,属于大山

◆王琳琳

顶着六月的骄阳,在北京最具标志性的建筑物故宫门前,我和刘业勇终于要见面了。他背对着我,举着一台DV做示意。我穿过川流不息的人群,小跑着奔向他,茫茫人海中,他显得那么瘦小。突然间,他转过身来,一双眼眸亮闪闪的,透着欢快与几分羞怯。

我陪他一起游览故宫。走着走着,他忽然弯下了身,捶了捶自己的腰。

“怎么了?”我赶忙问。他腼腆地笑了笑,有点不好意思地低声说道,“走平路累。在山里走上走下反而不累。”

一瞬间,我愣住了。想起刚才他新奇地举着DV到处去拍的样子,一时之间,竟难以把他与那个在大山之中用13年青春年华追逐长臂猿的人划上等号。

到底是怎样的信念让这个年轻人选择了深山保护长臂猿这样寂寞淡泊的人生?我不知道。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然而他说“时间紧”,只选择了去长城、故宫游览。面对我的困惑,他歪歪头,掰着手指数说:“我现在有护林员、监测长臂猿、监测竹叶猴3个职务。”仿佛解释了一切。

我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他要尽快赶回去的原因——莽莽无量山,拳拳万物情。有些事,一旦选择,就是一辈子。他是属于大山的。在那里,有他牵挂的西黑冠长臂猿,以及万类万物。他们像风一样自由,像云一样飘动,都获得了众生平等的温柔相待。



◆特约撰稿冯永锋

去年9月的一天,凌晨4点,一辆颇为破旧的小面包车缓缓驶出了黑龙江省林甸县城。林甸县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付建国,又开始了他新一天的护鹤之旅。每年秋天,丹顶鹤向南迁徙之际,他都是这么过的。

5点,在一阵疯狂的犬吠声中,4声枪响传来。枪声并不是同时响的,每一声之间都隔着那么几分钟。最后一声之后,付建国等待了一阵,然后掏出手枪,给林甸县森林公安局局长打了一个举报电话。

遇上这样的事,只能找公安部门介入了。枪声太近,湿地太宽广,开枪人随时可以逃逸。但保护者听不

◆本报记者王琳琳

29岁的刘业勇与其他年轻人一样,有一颗火热跳动的心,喜欢热闹,喜欢看红的、绿的、黄的、蓝的各种色彩,喜欢听刘欢、韩红的歌。每个月,他只有几天休息时间,这时,他最大的享受不是这些现实世界的热闹,而是能吃顿饱饭,好好睡上一觉。很少有人知道,他工作的地方在交通闭塞的大山之中,常常只有一个人——他自己,只有一个单调的重复——追猿,只有一种无言的坚持——守护。在这个枯燥辛苦的工作岗位上,年纪轻轻的刘业勇已经坚守了整整13年,他把爱投向的对象便是人类之外的另一群精灵——西黑冠长臂猿。

十六岁的追猿少年

刘业勇一直觉得,自己与西黑冠长臂猿之间,有一种冥冥中注定的缘分。

他出生于云南省景东县大寨子村,推开家中门窗,便是莽莽无量群山。山花在这里怒放,草木在这里葱茏,江河在这里流淌,还有世界上濒危的珍稀动物西黑冠长臂猿,也在这里成群结队地生活。

然而,在16岁之前,刘业勇从没有听说过西黑冠长臂猿,更不知道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种群数量不超过1300只,比明星物种大熊猫还要濒危。那时,萦绕在刘业勇生活里的最大烦恼,是贫穷的家庭已经无法支撑自己继续上学了。自己的未来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如有千钧重,沉甸甸地压在刘业勇心头。

2002年,刚刚年满16岁的刘业勇无奈之下辍学回家。就在他觉得前途迷惘而担忧踌躇之际,他不知道,他的人生即将因为西黑冠长臂猿而发生彻底改变。

2004年,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学龙派自己的学生范朋飞前来无量山,开展西黑冠长臂猿的“习惯化”研究。

“习惯化”简单来说就是让动物熟悉人,通过人工长期跟随,使动物在人近距离观察时不会惊怕。这是对西黑冠长臂猿开展保护的第一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长期观察长臂猿,积累基础的科学数据,从而进行相关分析、研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尚显稚气的刘业勇被蒋学龙看中了,将其选为自己学生范朋飞的向导,开始了“追逐”长臂猿的艰苦工作。

刚开始,刘业勇什么都不懂,只觉得爬山好玩,长臂猿很神奇。长臂猿每天出现在不同地方,“它在树上‘飞’,我在地面上跑”。然而,要“习惯化”这些被老人们称为“风猴”的西黑冠长臂猿并非易事。树冠精灵长臂猿终年生活在树上,几乎从不下地,且极其机敏,一有风吹草动,便遁入密林之中,双臂交替一荡就10米

远,很少有人能看到它们。

本来,让长臂猿熟悉人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食物贿赂。但投喂会导致研究对象对人类产生依赖并改变它们的食性。范朋飞、刘业勇他们弃易从难,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通过长期蹲守与长臂猿建立互信。

云南旱雨季节分明,每到雨季来临,无量山中雨量瓢泼。这时,从一亩三分地中挣生活的人也不出门,以避开山洪和泥石流。可为了“习惯化”长臂猿,刘业勇他们必须长年待在山,经常好多天不下山。

曾经,几位与刘业勇一起上山追逐长臂猿的村里人,尝试过一段时间之后,纷纷放弃了。他们说“比家里种田还

一样,时时出现在他的心头。所以,他经常去丹顶鹤出没的一些地方寻鹤。只有知道鹤在哪里,才可能去保护它们。

与林甸县育苇场相连的齐齐哈尔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驯养了400多只的丹顶鹤,这些丹顶鹤日常要做动物表演。生意的兴旺刺激了野外捡蛋的“繁荣”。有消息流传说,一枚内里含有胚胎的蛋,至少可以卖2000元。

让付建国焦虑的正在于此。他所在的野生动物保护站,保护的核心区域是一块面积将近30万亩的半天然湿地,当地人称之为育苇场。以前是国有经营,主要给附近的造纸厂提供原料,现在转为市场承包,由一家公司总承包后分包出去,芦苇的多样性应用得到拓展,但也侵占了丹顶鹤的繁殖地。

付建国对此很是担心。作为全国丹顶鹤繁殖密度最高的地方,每年约有30对左右的丹顶鹤来育苇场繁殖后代,一次最多产两枚,因为一对丹顶鹤夫妇只能保护两个宝宝健康成长。

“借钱”护鹤的付建国

但是,捡蛋的人不是在丹顶鹤一下蛋就来捡,而是等到临出壳前一左右,壳中有幼体时再捡,然后放到人工孵化箱里孵化。丹顶鹤发现子女被人掠夺,只好忍痛开始重新交配。但这时已错过了幼仔成活的最佳季节。

“借钱”护鹤,也许是条路

2007年,国家鸟类基金会专家苏立英博士开始呼吁人们关注野生丹顶鹤的蛋被人掠夺的问题。从那时起,付建国就和一些人暗暗调研齐齐哈尔大庆湿地的捡蛋状态,当地的森林公安、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也一直在高度防范捡蛋人的行为。

但监督和检查往往很难。因为,当看到有人捡蛋,等赶过去时人早已跑远了。即使狭路相逢遭遇上了,捡蛋人把蛋往旁边一藏,也没办法说什么。违法与执法,触犯与监督,就在这样的博弈中此消彼长。在这样不良风气的笼罩下,丹顶鹤的野外种群一直未见恢复,

仍旧在2000只以内,而半笼里的数量,却已经增到了1000只以上。

2014年秋天,付建国想了一个办法,“借钱”护鹤。他注册了支付宝,开通了面向公众的账号,在一些环保组织的帮助下,向社会求助,向全国所有有心护鹤的人“借钱”保护鹤类。

他是这样计划的,以湿地生活的30个丹顶鹤家庭为基数,寻找30个人类家庭,每个家庭无息借他5000元,一年后返还。他用这些钱把整个育苇场承包下来。这样,防止春天时有人再进苇场打渔、捡蛋。等到7月份,丹顶鹤繁殖成功,他再把育苇场承包给那些打渔的人。这时候,鱼也长大些,承包的人能获得更高的收益。

保护的有效之道还在于持续巡护。付建国还想着,在每个丹顶鹤的巢穴以及重要路口安装监控,这样他坐在监控室里,就可以保证它们的安全。

这个想法在互联网上传播起来后,参与的人络绎不绝。积极的反馈让付建国乐观了一阵,他想每年要组织这些

共同护鹤人,到湿地参观一次,共同巡护,共同保护丹顶鹤。

但付建国仍旧是焦虑的,他担心时间不等。因为在声明刚刚发布没几天,他就发现一只上了跟踪器的白枕鹤被打死在芦苇深处。几天后,他又发现了一只受伤的丹顶鹤幼鸟,精心呵护几天后,还是在他面前死去了。

但是,付建国还有期待,他盼望着,也许有一天,丹顶鹤的威胁变少了,鹤蛋都变成小鹤,小鹤都长成成鹤,在迁徙的道路上一路平安,然后,第二年再如期归来。

